



国家安全与情报丛书

总策划◎王吉胜

主 编◎高金虎

阐释世界情报历史三次飞跃
探索中西情报思想不同脉络

中西情报思想史

高金虎 吴晓晓 等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国家安全与情报丛书

总策划◎王吉胜

主 编◎高金虎

中西情报思想史

高金虎 吴晓晓 等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情报思想史 / 高金虎, 吴晓晓等著.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55-0924-2

I. ①中… II. ①高… ②吴… III. ①情报工作—思想史—世界 IV. ① 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 第 004901 号

中西情报思想史

作 者	高金虎 吴晓晓 等
责任编辑	蔡传聪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924-2
定 价	50.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22699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丛书总序 >>>

以情报工作为研究对象，探索情报工作规律，研究改进情报工作途径的学科，在西方称为情报研究，在中国则称为军事情报学。名称不同，本质一致。

长期以来，由于情报工作本身存在着较强的隐蔽性，各个国家对情报机构的活动秘而不宣，其情报档案也不公开，从而影响了情报工作受关注的程度，情报活动成了历史研究中被遗忘的一角。

西方的情报研究，始于 1949 年美国学者谢尔曼·肯特《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一书的出版。肯特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欧洲非洲科的科长，战后一度回到耶鲁重执教鞭，随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主任。在《战略情报》一书中，肯特把战略情报定位为战略家制订和执行计划所必需的情报，是身居高位的文武官员保卫国家福祉必须掌握的知识。《战略情报》一书成为美国情报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肯特还在中央情报局倡导开展情报研究，以使情报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他的倡议下，中央情报局成立了情报研究中心，创办了《情报研究》，从而为情报理论和情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962 年，美国兰德公司智囊罗伯塔·沃尔斯泰特出版的《珍珠港：预警与决策》开启了情报研究的新领域：预警和情报失误研究。1978 年，国际学术界在德国波恩和斯图加特召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信号情报研讨会议，推动了情报

史的研究。一批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战略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加入了情报研究的行列，有力地推动了情报研究。今天，在英语世界，情报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情报研究起步并不算晚。早在 2500 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兵圣孙子就写出了著名的《孙子兵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情报学著作。孙子对战略情报要素认识的完备性、情报评估的重要性、情报谋略的微妙性、情报理论的科学性的分析，即便与 2500 年后谢尔曼·肯特的著作相比也不逊色。抗战期间，军统特工郑介民出版《军事情报学》，书中所勾勒的军事情报工作体系与今日西方的情报研究体系并无本质差别。1988 年以后，多种版本的《军事情报学》和其他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情报研究学科的发展。今天，军事情报学已经列入了我国研究生与学位教育的学科门类。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即致力于军事情报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涉猎情报研究的诸多领域，并偶有心得。我深感中国的军事情报研究与美国等先进情报大国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理论研究的滞后成为制约中国军事情报工作的重要因素。有感于此，在金城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主编了《情报与反情报丛书》，开始引介西方先进情报大国的情报研究成果，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迄今，丛书已经出版多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得到学术界的热烈反应。

在主编《情报与反情报丛书》的同时，我也开始了对军事情报学的系统思考。我认为，军事情报学主要探讨军事情报工作的基本理论和运用理论，从整体上认识军事情报工作的一般发展规律，揭示军事情报工作的本质，提升军事情报工作水平，更好地服务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决策。军事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包括历史研究、思想研究、理论研究、应用研究等内容。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策划了这套《国家安全与情报丛书》。内容涉

及军事情报学基础理论、情报历史、情报思想、情报体制、情报分析、战略欺骗等，基本涵盖了情报研究的各个领域。丛书主要记录了我在军事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心得，反映了我对军事情报工作的认识。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推动我国的情报研究，并对改善我国的国家安全工作有所裨益。

高金虎

目 录 >>>

导 论	1
什么是情报	2
情报工作要素	9
计与情报	13
研究状况	14
主要内容	16
第一章 古代情报思想	20
第一节 孙子的情报思想	23
贯穿《孙子兵法》的情报认识论	25
先知：情况认识的重要性	27
知彼：情报搜集手段的多样性	30
“称胜”：战略情报要素认识的完整性	32
“庙算”：情报评估的科学性	38
知“道”：透过现象看本质	40
诡道：情报谋略的微妙性	41
反间：情报作战的枢纽	44
评价	45

第二节 诸葛亮的情报思想	47
先谋后胜：战略计划的基础	51
“善知”：侦察的内容和要求	52
“识时务”：战略评估典范	56
“察情”：透过现象看本质	58
“耳目”：侦察幕僚的地位作用	59
评价	60
第三节 《李卫公问对》中的情报思想	61
知彼知己，兵家大要	64
致敌虚实，奇正相生	65
为将之道，先胜后战	69
或以间成，或凭间败，非仁义不可使间	71
置驿以通斥候，多方搜集情报	74
评价	75

第二章 近代情报思想

第一节 拿破仑的情报思想	78
对情报的基本认识	79
专业性情报机构的创立者	81
应通过多种手段搜集情报	82
通过情报分析消除战争迷雾	84
反情报是维护国内安全的盾牌	86
情报谋略是力量倍增器	87
评价	89
第二节 克劳塞维茨的情报思想	90
战争计划	92
战略要素	94

对情报的认识	98
情报的不确定性	101
情况认识的概然性	103
评价	106
第三章 现代情报思想	108
第一节 丘吉尔的情报思想	109
情报观念	111
高明的预警大师	116
现代英国情报体制的倡导者	121
对信号情报的倚重	124
通过隐蔽行动推进国家利益	126
“用谎言保卫真理”：丘吉尔的情报谋略	136
做自己的情报官	143
评价	146
第二节 斯大林的情报思想	147
对情报工作的认识	147
情报体制应高度集中	154
高度重视谍报工作	158
通过反情报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安全	161
“革命的圣物”：斯大林与“积极措施”	165
情报分析是情报人员的“危险猜测”	168
情报与决策脱节	174
评价	176
第三节 毛泽东的情报思想	179
对情报的认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180
战争预测：科学预见大师	182

战争要素：决定战争的根本因素	184
情报搜集：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	188
情况判断：16字要诀	192
知彼知己：“把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	195
实事求是：把握战争的概然性	196
评价	198
第四节 多诺万的情报思想	200
对战略情报的认识	202
情报机构应协调管理	204
情报分析是情报工作的中心环节	209
向敌国的士气和精神防线发动心理攻势	213
评价	215
 第四章 当代情报思想	 221
第一节 谢尔曼·肯特的情报思想	223
战略情报的提出及界定	225
战略情报分析与评估	228
情报体制建设的基本蓝图	233
对情报与决策关系的初步探索	237
评价	241
第二节 艾伦·杜勒斯的情报思想	246
情报职能：“先导”“预警”“威慑”	248
美国现代情报体制的奠基者	250
“三心二意”的情报界首长	253
情报搜集：谍报手段、公开资料、技术情报	254
谍报艺术：渗透、攻心	259

反情报：防御与进攻	261
隐蔽行动的鼓吹者与践行者	263
情报分析：理论上的巨人，实践中的侏儒	266
情报分析：并非纯粹的科学	270
对情报与决策关系的认识	272
公开社会中的情报工作	274
评价	278
第三节 史密斯的情报思想	280
情报管理：保证情报机构高效运转	281
情报协调：让情报体系顺畅运转	285
《国家情报评估》：规范化生产与专业化建设	294
隐蔽行动：在规范和制约中良好发展	297
评价	303
第四节 艾森豪威尔的情报思想	304
技术情报的倡导者	307
“司令官评估”：东西方兵学文化对接的典范	310
政策山机制：对情报—决策关系的全新认识	312
评价	315
第五节 杰克·戴维斯的情报分析理论	321
对情报分析技巧的认识	324
对战略预警的认识	335
对机遇分析的认识	344
评价	354
参考书目	357
后 记	362

导 论

情报思想是人类认识情报工作、总结情报工作经验与教训而形成的智慧结晶。情报思想史则是人类认识情报工作、总结情报工作发展规律的理论学说。情报思想通过情报人物体现出来。这些情报人物，包括情报工作的领导者、实践者和理论家。他们对情报的认知，他们的情报实践，构成了其情报思想的主要内容。情报思想源于情报实践，高于情报实践，最终可以指导情报实践，推动情报工作的发展，促进情报实践的飞跃。

在人类 6000 年的情报史上，这样的飞跃只出现过数次。第一次飞跃发生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初步形成，大量的军事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出现了管子、孙子、吴起这样的战略家和情报理论家。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 19 世纪初的拿破仑时代。拿破仑战争不仅荡涤了欧洲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也促成了资产阶级军事制度的建立和军事学术的繁荣，诞生了像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这样的理论大师。他们形成了世界情报思想史上的第二座高峰。

第三次飞跃发生在 20 世纪中叶。两次世界大战，数百场局部战争，无数次战争危机……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为情报工作的发展提供

了丰富的养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情报工作在 20 世纪后半期走向了成熟，情报工作出现了第三次飞跃。与情报工作同步发展的，是情报理论的成熟。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剖析几个基本名词——情报、情报工作要素（intelligence elements）和情报评估，也就是弄清什么是情报、哪些活动属于情报活动，从而确定本书的研究范围。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对过去的把握与理解，反映了当代人现实的认知需求和发展需求。历史正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其参照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重合，过去才能为人所理解。我们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人类的情报工作以及人们对情报工作的认识，即所谓情报思想。

什么是情报

关于什么是情报，中外情报界和学术界有诸多认识，但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定义。根本性的争论在于：情报究竟是否包含己方内容？

关于情报最权威的定义出自冯·克劳塞维茨。他在《战争论》第六章“战争中的情报”中指出：“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这一观点对西方情报界的影响深远。此后，情报专属彼方的观念被西方情报界和学术界广泛接受。

以美国为例。美国《国防部军事及相关用语词典》将情报定义为，对所获得的有关外国或地区的信息进行搜集、处理、综合、分析、评价和诠释所得到的产品，或通过监视、调查、分析或理解而获得的有关对手的信息和知识。^①

^①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as amended through 9 May 2005) at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new_pubs/jp1_02.pdf.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弗农·沃尔特斯 (Vernon Walters) 认为：情报是可能影响我们生活和人民安全的外国的力量、资源、能力和意图方面的信息，通常无法通过公开途径获得。^①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发的联合出版物《联合情报》不同意克劳塞维茨关于情报的认识，但在论述情报的性质时，它依然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这句名言。^②

中国古代没有“情报”一词，兵家在论及情报时大多用“情”或“知”“计”。如《鬼谷子·谋》称“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中国兵圣孙子在《孙子兵法》中也多次使用“情”字，如“校之以计，索其情”，“先知者……知敌之情者也”。但他用得更多的是“知”：“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据统计，在《孙子兵法》中，“情”共出现了7次，而“知”则出现了79次。

“知”的内涵是“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孙子反复论述了知彼知己的重要性，如“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因此，“知彼知己”实为中国的兵学传统，孙子以后的中国兵家对此都表认同，如《李卫公问对》强调，“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

近现代中国的战略研究学者，对知彼知己的观念持肯定看法，但情报研究界却将己方情况排除在外，而将情报完全定位于彼方情报。彼方情报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亦不乏拥趸。

① Vernon Walters, *Silent Missions*(Garden City, New York:Doubleday, 1978), p.621.

② Joint Publication 2-0, *Joint Intelligence*(June 22, 2007), chapter I, p.1.

1915年版《辞源》将情报定义为“军中集种种报告，并预见之机兆，定敌情如何，并报于上官者”。

1939年版《辞海》：“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曰情报。”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对情报的定义是“为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搜集的敌对国家、集团和战区的有关情况以及对其研究判断的成果。它是制定战略方针、国防政策和各级指挥员下定决心、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

张晓军认为，“军事情报是为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搜集的情况及其研判成果。是制定国防政策、战略决策和指挥作战的重要依据”^①。定义本身没有涉及“彼方”与“己方”的问题，但实际上，他推崇的是“知彼知己”的情报观念。这在中国主流情报学术界中算是一个例外。

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的情报认知观念，倒是在美国情报学界遇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

美国情报学者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认为，情报是一种与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相关，用以保证国家安全利益、应对现实及潜在对手威胁的信息。这里，舒尔斯基并没有刻意指出，情报究竟是否仅属于关于对手的知识，不过他指出，对手并非仅指敌人，有时盟邦也会成为对手。^②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用户指南》认为情报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知与先知，是美国决策者决策与行动的先导”^③。

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马克·洛文塔尔（Mark M. Lowenthal）指出：

① 张晓军：《军事情报学》，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② Abram N. Shulsky & Gary J. Schmitt, *Silent Warfare: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Inc., 2002), pp. 1-3. 本书中文版由金城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

③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 Consumer's Guide to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99), p. VII.

情报是对国家安全而言重要的特定类型的信息。^①

2005年,美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能力调查委员会报告指出:“情报是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知识。它能辅助文职人员和军事领导人做出更加博闻的决定,准备应对并反制潜在的和正出现的对美国利益的威胁。”^②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站提供的情报定义则认为:“情报是按照已知或预期的用户需求,所获取和提供的证据,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③

美国情报学者法拉戈(Ladislav Farago)认为:情报为有价值的消息,即可靠的、富有意义的,对其重要程度曾及时进行过鉴定的消息。^④

美国兰德公司出版的《战争中正在变化的情报角色》明确指出,了解己方部队的能力、局限和位置的准确情报,与知彼(敌)同样重要。^⑤

鉴于以上争议,本书试图从下面几个角度来探索情报的定义。

首先,情报工作的本质是从杂乱无章的情报现象中,发现各种情报现象之间的内部联系(相关性),洞察事物的本质,预测其可能的发展趋势。

关于情报的预测性,学术界没有不同意见。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用户指南》认为情报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知与先知”。美国中央情报主任艾伦·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在《情报艺术》一书中援引孙子“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接着又援引胡佛第二委员会的观点,认为情报处理的是采取行动之前都必须知晓的事务。^⑥ 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更将情报分成三种形态:基

① Mark M. Lowenthal, *Intelligence: From Secrets to Policy*(Washington, D.C.:Potomac Books, Inc., 2002), p.8. 本书中文版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② The Commission on the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March 31, 2005), p.582.

③ www.intelligence.gov/2-character.shtml.

④ [美]法拉戈:《斗智》,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⑤ 转引自张晓军:《〈武经七书〉军事情报思想初探》,载《军事历史》2002年第1期。

⑥ Commission on Organization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the Hoover Commission],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June 1955, p. 26.

本描述型、动态报告型和评估预测型。一份情报文件，要描述已经发生的事实，分析正在发生的事态，并就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趋势进行评估和预测。

怎样才能做好评估与预测？怎样才能把情报分析人员与算命先生区分开来？这只有通过发现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才能做到。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①。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实事求是”，即透过纷繁复杂的情报现象，洞察情报事件的本质，预测其进一步的发展趋势。

要使情报体现出预测性，仅关注彼方情况是不够的。从军事辩证法的角度看，知彼和知己是情况认识过程中的两个环节，两者互为依据。离开对己方情况的认识，我们对彼方情况的认识是不完整的。割裂彼方情况与己方情况之间的联系，不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就不能认清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预测事物发展的方向。我们常说不能过低估计敌人，过高估计自己，实际上，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过低估计了敌人，也就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反之亦然。因此，孙子在讲“知”的时候，把“知彼”与“知己”联系在一起，在“五事”和“七计”中，特别提出要就双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以得出最终结论。在现代美国情报术语中，这被称为“纯净评估”（Net Estimate）或“司令官评估”（Commander's Estimate）。在这一评估过程中，情报人员和其他人员要回答下列问题：敌方的实力，敌方表现实力的意图，我方的实力，我们可能的反应计划。在回答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决策者才能做出最终决定。因此，要认清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洞察事物的本质，就必须把彼方情况与己方情况联系起来。

^①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63页。